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

张明志 何鸿亮

摘要：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促使企业更多地选择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较低的市场，从而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从2000—2006年期间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显著抑制作用转向了2007—2013年期间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显著抑制作用；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出口规模较大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对出口规模较小企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对于如何积极应对外部需求冲击以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作用。

关键词：外部需求冲击；出口市场多元化；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3) 8-0001-1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在不断加深，面临的外部需求冲击亦日趋频繁。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世界各国（地区）的经济，全球贸易处于崩溃的边缘，之后世界经济虽然仍维持增长态势，但增速明显放缓。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伙伴高度集中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由此，自然而然会提出两个问题：外部需求冲击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是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不仅有利于探索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的新思路，从而助力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而且也有助于企业正确有效地应对外

[收稿日期] 2023-03-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外部冲击与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研究：全球价值链视角”（21YJA79007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贸易冲击与中国区域劳动力就业：机理研究、实证检验与量化评估”（72173110）

[作者信息] 张明志：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信箱 mzzhang@xmu.edu.cn；何鸿亮：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部需求冲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经历了大幅的下降和波动,关于外部需求冲击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大量涌现出来,如 Egger 等(2013)^[1]、Aghion 等(2022)^[2]。总体上,相关文献主要基于全球、国家和企业等层面展开分析与讨论。从全球层面的研究来看,许多文献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需求减少而造成全球贸易的下滑,如 Alessandria 等(2010)^[3]、Engel 和 Wang(2011)^[4]、戴翔(2016)^[5]。一些文献从国家层面考察了外部需求冲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如 Eaton 等(2016)^[6]、Bems 和 Giovanni(2016)^[7]。而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相关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产品出口的影响,如陈晓华等(2017)^[8]、谢杰等(2018)^[9]。

一般而言,出口多元化既可以指出口产品多元化即出口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又可以指出口市场多元化即出口目的地数量的增加或出口额在各个目的地市场的分布趋于均匀。从既有文献来看,早期对出口多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并聚焦于出口产品多元化,如 Imbs 和 Wacziarg(2003)^[10]、Cadot 等(2011)^[11]、Agosin 等(2012)^[12]。基于国家层面研究的相关文献强调了减少不确定性、最小化汇率波动以及人力资本发展等因素对出口多元化的促进作用(Hausmann et al., 2007^[13]; Agosin et al., 2012)。然而,仅在宏观层面研究出口多元化,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无法有效刻画行业和企业的出口多元化行为及其差别,从而不利于深入研究相关问题。近年来,由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不断涌现,大量的研究开始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视角。企业是出口贸易活动的行为主体,是出口活动中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对外部冲击的反应也更加敏感(Vannoorenberghe, 2012^[14], Vannoorenberghe and Janeba, 2016^[15]; Vannoorenberghe et al., 2016^[16])。因此,基于企业微观层面而非国家宏观层面来研究出口多元化,其意义完全不同。

从微观层面的研究来看,不少文献是在 Melitz(2003)^[17]的模型基础上拓展而来的,重点探讨企业出口时如何选择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但相关文献仍然聚焦于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钱学锋和熊平(2010)^[18]、易靖韬和乌云其其克(2013)^[19]等主要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Mayer 等(2016)^[20]研究了出口市场竞争对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影响;钟腾龙和余森杰(2020)^[21]构建了外部需求指标,研究外部需求对采取不同竞争策略的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袁莉琳等(2020)^[22]基于马歇尔需求第二定律分别从出口目的地和企业两个视角考察了外部需求冲击对产品组合和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同样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多元化的影响,但重点关注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鲁晓东和李林峰(2018)^[23]研究发现,从平抑出口波动的效果来看,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比出口产品多元化更为有效;吴嵩博和崔凡(2020)^[24]以企业进入开发区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出口目标市场选择与偏好的影响。还有一些文献同时关注到了企业的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如黄先海和周俊子(2011)^[25]从地理和产品两个维度来考察经济

波动、产品价格与中间产品贸易的关系；鲁晓东和李林峰（2018）检验了企业在产品和市场组合上的多元化水平对其出口波动的影响，并对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

就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内涵与测度而言，用企业出口目的地的数量来衡量相对直观，且出口目的地数量的多寡也能说明问题。从一国的角度来看，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可以使国家间的外部需求冲击互相抵消，只要不同目的地市场的需求冲击不是过于紧密同步，出口市场多元化就可以分散风险从而减少本国贸易的波动（Caselli et al., 2020）^[26]。同时，对于企业而言，产品能够出口到更多的目的地市场固然重要，但对于既定数量的出口目的地市场，企业在各个不同目的地市场出口的多与少同样意义重大。因此，与既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中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企业出口目的地市场总数的增加；二是企业出口额在各个目的地市场的分布更加趋于均匀，亦即企业出口市场集中度的下降。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基于企业层面而非宏观层面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如何影响出口市场多元化，丰富了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文献；第二，由于已有文献主要探讨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忽视了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分布及其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有文献关于企业出口多元化研究的不足；第三，本文以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为视角，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选择的影响，并考察了外部需求变动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异质性影响。

二、理论假说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1. 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

企业出口时面临进入目的地市场的相关成本，如了解出口市场消费需求、市场营销以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成本（Roberts and Tybout, 1997^[27]；Bernard and Jensen, 2004^[28]；Lawless, 2009^[29]）。与出口目的地相关的成本可以分为出口可变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出口可变成本伴随企业出口规模的变动而变动，而出口固定成本则不随企业出口规模的变动而变动。

一般而言，出口可变成本包括货运成本和时间成本在内的运输成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亦称之为“冰山成本”。对于出口可变成本的这一界定，学界没有太多的异议。但对于出口固定成本这一概念，学界似乎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例如，Roberts 和 Tybout（1997）认为，出口固定成本主要包括企业对国外市场的探索成本、对国际市场 and 外国消费者需求特征信息的搜集和处理成本、与国外经销商建立联系的成本、本国商品为获得国际标准认可而进行的调整和修正以及合同成本等。Baldwin 和 Okubo（2006）^[30]基于多产品异质性模型将出口固定成本分为企业的总体出口固定成本、对特定市场的出口固定成本和对特定产品的出口固定成本。Baldwin 和 Okubo（2006）将以前认为的一次性出口固定成本转变为阶段性的出口

固定成本，例如，A 国企业为了开拓 B 国市场，都需要支付 f_x 的出口固定成本，在这基础上，A 国企业每年往 B 国出口一种产品都需要额外支付产品的出口固定成本 f_{xk} 。如此一来，出口固定成本会因为不同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体系、劳动力水平等方面的显著差异，而导致企业间的出口固定成本也存在不同。

本文借鉴 Lawless (2009) 的做法，把与出口目的地相关的信息成本、合同执行成本、法律和监管成本等这些不随出口规模变动而变动的成本界定为出口固定成本，同时为避免发生歧义，使用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这一专属概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界定的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这一概念主要强调的是出口固定成本与企业自身的特征如企业出口规模或出口经验不存在相关性，突出了出口固定成本与出口目的地市场特征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出，本文对于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这一概念的界定，其内涵接近于交易成本^①。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不难看出，总体上，出口到发达国家而发生的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较低，而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而发生的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较高。这一点亦可由后文以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WGI) 来衡量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的相关结论进行验证。

2. 外部市场需求、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与出口市场多元化：理论分析

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动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盈利水平，而且可能引发企业出口决策的调整 (Mayer et al., 2014; Mayer et al., 2016^[31])。出口企业为了实现盈利，必须能够支付得起进入出口目的地市场的相关成本。Lawless (2009) 认为不同出口目的地市场的进入成本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出口目的地市场的临界出口生产率水平也是不一样的。企业要出口到进入成本越高的目的地市场，其临界出口生产率水平也需要越高 (Helpman et al., 2008)^[32]。换言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更容易跨过较高的临界出口生产率水平，从而出口到更多的目的地市场，而不同出口目的地市场之间不同的临界出口生产率水平导致企业会根据目的地的“优先级”顺序进入出口目的地市场 (Lawless, 2009)。

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尝试从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角度分析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在理论分析中若没有特地指明以出口目的地数量来衡量的出口市场多元化，则文中对于出口市场多元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强调的是企业出口额在各个目的地市场的分布更加趋于均匀，亦即企业出口市场集中度的下降。不同的出口目的地市场，其市场需求水平和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是不一样的。总体上看，较之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水平更高，同时市场交易成本更低。立足于中国，无论是基于宏观经济层面还是基于企业个体层面，出口到欧美目的地市场的占比长期保持高位，因此正向外部需求冲击主要表现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水平的大幅提升，而负向外部需求冲击也主要表现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水平的大幅下降，加之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进入固定成本低，由此可推演出如下结论：正向外部需求冲击导致中国企

^①Williamson (1985) 认为交易成本包括相互依存的合同签订前交易成本和合同签订后交易成本。

业更多地去满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促进了企业出口目的地集中度的提升，亦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在负向外部需求冲击下，当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进入固定成本低的优势无法弥补其市场需求水平大幅下降所形成的劣势时，负向外部需求冲击会促进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去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从而降低了企业出口目的地集中度，亦即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在负向外部需求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下降幅度小，虽然其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相对较高，但对于企业而言，把原先满足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出口转向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 理论模型构建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外部需求冲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本文尝试基于 Melitz (2003) 的模型，借鉴 Lawless (2009) 的模型构建，纳入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建立一个企业出口多目的地的理论模型并提出假说。

假设出口目的地 j 的消费者消费连续的差异化产品 ω 且效用函数为 Dixit-Stiglitz 形式，具体为 $U_j = [\int \alpha_j(\omega) q_j(\omega)^{\frac{\sigma}{\sigma-1}} d\omega]^{\frac{\sigma-1}{\sigma}}$ 。假设本国的代表性企业 i 只生产一种产品（用 φ 代表企业的生产率和产品，同时 φ 的不同也用来指代企业异质性）。企业面临出口目的地 j 的消费者对产品 φ 的需求为 $q_{ij}(\varphi) = \alpha_j(\varphi) \frac{p_{ij}(\varphi)^{-\sigma}}{P_j^{1-\sigma}} Y_j$ ，其中， $p_{ij}(\varphi)$ 表示在本国企业 i 生产并出口到目的地 j 的产品价格， Y_j 表示出口目的地的消费者总收入或总需求， $P_j = [\int p_{ij}(\varphi)^{1-\sigma} d\varphi]^{\frac{1}{1-\sigma}}$ 表示目的地 j 的价格指数（即标准的 D-S 价格指数）， $\alpha_j(\varphi)$ 表示出口目的地对产品 φ 的需求份额， σ 是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其取值大于 1。关于替代弹性的取值问题，相关讨论可参见 Broda 和 Weinstein (2006) [33]、樊海潮和郭光远 (2015) [34] 的研究。

基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贸易成本的假设，企业 i 的产品出口到目的地 j 的最优价格为 $p_{ij}(\varphi) = \frac{\sigma}{\sigma-1} \frac{\tau_{ij} c}{\varphi}$ ，其中， τ_{ij} 为本国出口到 j 国的冰山成本，包括关税和运输成本等， c 为企业生产的可变成本，由于生产只需要劳动这一种要素，因此可变成本即为本国的工资 w_i 。

由于本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与出口目的地无关，而且存在连续统的消费者，这意味着出口目的地 j 对生产率为 φ 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总需求为：

$$x_{ij}(\varphi) = p_{ij}(\varphi) q_{ij}(\varphi) = \alpha_j(\varphi) \left(\frac{\sigma}{\sigma-1} \frac{\tau_{ij} w_i}{\varphi} \right)^{1-\sigma} Y_j P_j^{\sigma-1} \quad (1)$$

此时，企业面临的出口利润为 $\pi_{ij}(\varphi) = \frac{x_{ij}(\varphi)}{\sigma} - f_{ij}$ 。

其中，企业面临的固定成本为 $f_{ij} = f^d + f_j^e$ ，具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与企业生产相关的固定成本 f^d ；二是与出口目的地 j 相关的固定成本即本文前面所界定的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 f_j^e 。

进一步，可以得到企业出口到目的地 k 的零利润条件为：

$$\pi_{ik}(\varphi_k^*) = \frac{x_{ik}(\varphi_k^*)}{\sigma} - f_{ik} = 0 \quad (2)$$

假设企业生产率不随时间变化，当且仅当企业的生产率超过了临界出口生产率水平 φ_k^* 时，企业得以出口到目的地 k 。随着出口目的地外部需求 Y_j 的增加，出口目的地的临界出口生产率水平 φ_k^* 会随之降低。如果某个企业 φ 的生产率水平足够进入第 k 个市场，即企业生产率 $\varphi \geq \varphi_k^*$ ，那么其就有能力出口到生产率门槛低于 k 的所有目的地市场。

(三) 假说的提出

为简化且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存在两种类型的出口目的地市场^①，以目的地 1 代表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以目的地 2 代表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水平高且市场进入固定成本低，即企业面临的总需求为 $Y_1 > Y_2$ ，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为 $f_1^e < f_2^e$ ，相应地，企业的临界出口生产率分别为 φ_1^* 和 φ_2^* 。进一步，由前述理论模型可得： $\varphi_1^* < \varphi_2^*$ ，由此，对于某一既定生产率水平的代表性出口企业而言，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当 $\varphi_1^* < \varphi < \varphi_2^*$ 时，企业只会进入固定成本较低的发达国家市场，无法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当企业生产率足够高时，即当 $\varphi_1^* < \varphi_2^* < \varphi$ 时，企业才可能同时满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以上分析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两种类型的出口目的地市场的需求是既定的。如果外部需求即出口目的地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动，那么其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究竟如何呢？

1. 基于正向外部需求冲击的分析

情形 1：企业一开始处于同时出口两个目的地市场的状态。在正向外部需求冲击下，假设企业面对的出口目的地 1 的总需求增长超过目的地 2，即 $\Delta Y_1/Y_1 > \Delta Y_2/Y_2 > 0$ 。则由理论模型可得：

$$\frac{\Delta x_{ij}(\varphi)}{x_{ij}(\varphi)} = \frac{\Delta Y_j}{Y_j} \quad (3)$$

由式 (3) 可知，随着出口目的地总需求 Y_j 的增加，企业面临的外部需求也同比例增加，且企业面临的来自出口目的地 1 的需求增长超过目的地 2，即 $\frac{\Delta x_{i1}(\varphi)}{x_{i2}(\varphi)} > \frac{\Delta x_{i2}(\varphi)}{x_{i2}(\varphi)}$ 。

由于发达国家市场的进入固定成本较低 ($f_1^e < f_2^e$)，可以得到：

$$\frac{\Delta x_{i1}(\varphi)}{x - \sigma f^d - \sigma f_1^e} > \frac{\Delta x_{i2}(\varphi)}{x - \sigma f^d - \sigma f_2^e} \quad (4)$$

^①为简化模型的推导，本文假设只有两种类型的出口目的地市场，但实际上若是在每种类型的出口目的地市场内部再根据其外部需求水平和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的不同进行细分，模型可推演出三个以上出口目的地市场，即更符合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情形。

且根据企业利润增长和出口增长的关系式 $\frac{\Delta\pi_{i1}(\varphi)}{\pi_{i1}(\varphi)} = \frac{\Delta x_{i1}(\varphi)}{x - \sigma f^d - \sigma f_1^e}$ ，可以得到：

$$\frac{\Delta\pi_1(\varphi)}{\pi_1(\varphi)} > \frac{\Delta\pi_2(\varphi)}{\pi_2(\varphi)} \quad (5)$$

即企业在发达国家目的地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增长。同时，由 $\frac{\Delta\pi_{ij}(\varphi)}{\pi_{ij}(\varphi)} = \frac{\Delta x_{ij}(\varphi)}{x_{ij} - \sigma f_{ij}^e} > \frac{\Delta x_{ij}(\varphi)}{\Delta x_{ij}}$ 可知，企业的利润增长的变动比例超过了出口目的地的需求变动。基于情形 1，企业可以在需求更大的出口目的地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即 $\Delta\pi_{i1} > \Delta\pi_{i2}$ 。

在利润驱使下，企业在出口量的选择上会倾向于更多地出口到原有需求更大的目的地，即发达国家市场。此时，由于企业的出口更加集中于需求高的出口目的地，即企业出口目的地集中度上升了，因此正向外部需求冲击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在正向外部需求冲击下，假设企业面对的出口目的地 2 的总需求增长超过了出口目的地 1，由理论模型可知，只有在出口目的地 2 的需求远远超过出口目的地 1 的情形下，上述结论才会发生改变。但出口目的地 2 是发展中国家，其需求增长要远远超出口目的地 1 即发达国家，显然有违现实。

情形 2：企业一开始处于只出口目的地市场 1 的状态。在正向外部需求冲击下，虽然企业面对的出口目的地 1 的总需求增长超过出口目的地 2，但是，在正向外部需求冲击使出口目的地市场 2 的需求增长足够大时，目的地 2 的出口临界生产率会低于企业生产率，即 $\varphi > \varphi_2^*$ ，那么企业就会增加出口目的地的范围，也就是正向外部需求冲击导致企业能够出口的目的地市场数量增加了。换言之，正向外部需求冲击有可能导致以出口市场总数来衡量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获得提升。但同时应该看到，这里出口市场总数的增加不会改变前面的结论，即正向外部需求冲击导致企业出口份额更加集中于目的地市场 1。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企业能够出口的目的地市场数量增加了，但新增加的市场需求更多地分布在原有的出口目的地市场。也就是说，即便处于情形 2，正向外部需求冲击仍然使企业出口在各个目的地市场的分布更加集中而非均匀化，亦即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

2. 基于负向外部需求冲击的分析

在负向外部需求冲击下，出口目的地市场 1 即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水平的下降幅度会更大一些^①，即 $\frac{\Delta Y_1}{Y_1} < \frac{\Delta Y_2}{Y_2} < 0$ 。而在负向外部需求冲击下，出口目的地市场 2 即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下降幅度小，即 $\frac{\Delta x_{i1}(\varphi)}{x_{i2}(\varphi)} < \frac{\Delta x_{i2}(\varphi)}{x_{i2}(\varphi)} < 0$ 。当欧

^①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 年中国对欧美国家货物出口额相比 2008 年下降了 16.5%，对发展中国家货物出口额相比 2008 年只下降了 15.7%。

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进入固定成本低的优势无法弥补其市场需求水平下降幅度所形成的劣势,亦即 $\frac{\Delta x_{i1}(\varphi)}{x - \sigma f_1^d - \sigma f_1^e} < \frac{\Delta x_{i2}(\varphi)}{x - \sigma f_2^d - \sigma f_2^e} < 0$ 成立时,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入固定成本相对较高 ($f_1^e < f_2^e$),但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已有的出口目的地市场需求减少,同时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获得的利润下降幅度也更大,即 $\frac{\Delta \pi_1(\varphi)}{\pi_1(\varphi)} < \frac{\Delta \pi_2(\varphi)}{\pi_2(\varphi)} < 0$,因此企业会降低其在已有出口目的地市场即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如果企业一开始处于同时出口两个目的地市场的状态,那么意味着企业的出口不再集中于目的地市场 1;如果企业一开始处于只出口目的地市场 1 的状态,那么企业不得不寻求新的出口市场,即把原先满足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出口转向了发展中国家市场即目的地市场 2。

总之,无论企业一开始是处于同时出口两个目的地市场的状态,还是处于只出口目的地市场 1 的状态,负向外部需求冲击很可能促进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正向外部需求冲击会抑制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在负向外部需求冲击下,当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进入固定成本低的优势无法弥补其市场需求水平下降幅度所形成的劣势时,负向外部需求冲击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

三、研究设计

(一) 基准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 Mayer 等 (2014)、Aghion 等 (2022) 的做法,构建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影响的基准计量模型:

$$Y_{it} = \alpha + \beta_1 DemandShock_{it} + \gamma_i Z_{it} + \delta_i + \delta_{st} + \delta_{ct} + \varepsilon_{it} \quad (6)$$

其中,被解释变量 Y_{it} 为企业 i 在 t 年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DemandShock_{i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所受到的外部需求冲击; Z_{it} 表示企业层面的其他影响因素,如企业盈利能力、企业规模等企业总额层面的变量和人均资产总额等企业人均层面的变量; δ_i 表示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δ_{st} 和 δ_{ct} 分别表示企业所在行业一年份和企业所在城市一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s 为 GB2 位码的行业;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 核心指标测度

1. 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

本文所界定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包括了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企业出口额在各个目的地市场的分布更加均匀;二是企业出口目的地市场总数的增加。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以及本文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这一概念的界定,本文用于衡量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指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体现企业出口市场分布的指标,具体包括基于 DIV 指数衡量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企业出口到欧美国家的出口额占企业出口总

额的比重 (CR)、企业层面前5大出口目的地的出口份额 ($CR5$) 和企业层面出口核心目的地市场份额 ($Core$)；另一类是体现出口目的地市场总数变化的指标，即数量指标 N 。

(1) 基于 DIV 指数衡量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基于企业出口目的地这一维度，对企业既定出口目的地的不同出口产品进行加总，即 $X_{idt} = \sum_j x_{ijdt}$ ，再根据 DIV 指数的定义，可以得到企业 i 在 t 时期基于出口目的地维度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 (DIV_{it})。 DIV_{it} 越大表示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越高。计算公式为 $DIV_{it} = 1 - \sum_d (X_{idt}/X_{it})^2$ 。

(2) 基于出口到欧美国家的市场份额衡量的企业出口目的地集中度指标，指的是企业出口到欧美国家的出口额占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CR_{it} = (\sum_{d \in \Omega} X_{idt})/X_{it}$ 。其中， X_{idt} 表示 t 时期企业 i 在出口目的地 d 的出口额， X_{it} 表示企业 i 在 t 时期的出口总额，即 $X_{it} = \sum_d X_{idt}$ ， Ω 表示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欧美国家的出口目的地集合。 CR_{it} 指数的值越大，表示企业出口目的地的集中程度越高，亦即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越低。

(3) 基于出口核心目的地集中度衡量的企业出口目的地集中度指标。本文定义企业中出口额占比最高的出口市场为企业的核心目的地市场，以 $Core_{it}$ 表示企业层面出口核心目的地市场份额，以 $CR5_{it}$ 表示企业层面前5大出口目的地的出口份额，并据此分别衡量企业出口市场集中度。

(4) 基于数量指标衡量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是以企业出口目的地的数量 (N_{it}) 来衡量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

2. 企业外部需求冲击

本文借鉴 Mayer 等 (2016)、Berman 等 (2015)^[35] 的方法来测算企业的外部需求冲击。首先，使用 CEPII-BACI 数据库中全球各个国家 (地区) 在 HS6 分位产品分类下的进口贸易数据，计算得到除中国外的目的地在进口来源国—进口产品层面的进口值，并作为衡量该目的地层面进口需求的指标；其次，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获得基于企业层面的出口数据，作为计算外部需求冲击的权重依据；最后，测算出企业层面的外部需求冲击。具体来说，企业 i 在 t 时期面对的外部需求冲击 $DemandShock_{it}$ 的测度方法如下：

$$DemandShock_{it} = \sum_d \sum_j \theta_{ijd} \ln(Demand_{jdt}) \quad (7)$$

其中，下标 i 表示出口企业，下标 j 代表 HS6 位码产品，下标 d 表示企业的出口目的地。 $Demand_{jdt}$ 代表目的地 d 在 t 年对产品 j 的进口需求，使用 BACI 数据库中目的地 d 对产品 j 的进口总值来衡量。由于出口目的地的进口需求包含了来自中国的进口，为了让外部需求冲击这一指标具有较强的外生性，本文将出口目的地的进口需求所包含的来自中国的进口部分予以剔除。 θ_{ijd} 为计算企业层面需求时使用的权重，借鉴 Aghion 等 (2022) 的做法，使用企业在出口初始年份的出口权重，即以 t_0 年企业 i 出口到目的地 d 的产品 j 的出口额占 t_0 年企业 i 出口总额的比重作为企业

样本期内的权重,即 $\theta_{jd} = x_{jd, t0}/X_{i, t0}$,该权重不随时间变动^①。此外,由于企业层面外部需求冲击指标 $DemandShock_{it}$ 的数值较大,本文对其做了标准化处理,即将数据处理成均值为1和标准差为0的形式。

3. 控制变量

除以上的核心变量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其他变量,包括企业资产总额、固定资产总额、销售额、职工人数、销售利润和资产负债率等。

(三)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1.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涉及到的数据来源如下:一是中国海关数据库,本文使用的企业层面出口贸易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二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来自国家统计局2000—2013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其统计范围是中国大陆地区销售额500万元以上(2011年起最低销售额标准调整为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三是BACI数据库,BACI数据库提供了全球贸易数据,包含各年份世界各国(地区)HS6位码产品的双边贸易数据;四是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标(WGI)数据库,本文使用该数据库提供的法制水平(RL)和监管质量(RQ)这两个分指标来刻画出口目的地的制度环境,并作为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的衡量指标之一;五是IMF国际金融统计(IFS)数据库,提供了不同国家(地区)CPI和名义汇率的年度数据。

2. 数据处理

(1)对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处理。由于本文的数据跨度为2000—2013年,中国的海关数据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时均更换了产品HS编码,本文在对中国海关数据库和BACI数据库进行匹配时考虑了产品编码对应,同时使用UNSTAS的代码对HS编码进行匹配^②。参考Lu等(2013)的做法,将企业名称中含有“贸易”“商贸”“经贸”“外经”“进出口”“仓储”“物流”“外贸”的企业标记为贸易企业,其他企业视为制造业企业。由于海关数据库的限制,有部分企业缺失了企业名,本文删除了这些数据。从经过处理后的数据来看,出口企业数从2000年的62 536家增长到2013年的269 943家,制造业出口企业从2000年的54 931家增长到2013年的195 877家。总的出口企业记录数有2 287 826条,其中制造业出口企业为1 744 081条,占比约为76%。此外,本文借鉴聂辉华等(2012)的做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清理。

(2)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匹配。参照田巍和余森杰(2012)的方法,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两套数据库中企业的匹配:第一步,通过企业名称进行匹配;第二步,采用企业的邮政编码以及电话号码的最后7位作为唯一识别码进行匹配,利用原始的工业企业数据总共可以匹配得到2000—2013年期间的出口观测值有709 426家企业,其中不重复企业数为207 028家。

^①下文会对这一权重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内生性讨论。

^②HS编码转换表来自<https://unstats.un.org/unsd/trade/classifications/correspondence-tables.asp>。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分别使用企业层面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指数和企业层面出口目的地集中度指数这两大类指标来衡量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就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1.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基于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指数

表1报告了以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指数 (*DIV*) 和数量指标 (*N*) 衡量出口市场多元化并基于基准计量模型式 (6) 进行回归的结果。表1第 (1)、(2) 列是基于 *DIV* 衡量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回归结果，第 (2) 列在第 (1) 列的基础上均增加了企业维度、行业一年份维度以及城市一年份维度的固定效应。第 (3) 列是以数量指标 (*N*) 来衡量出口市场多元化并基于基准计量模型式 (6) 进行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指数 (*DIV*) 还是数量指标 (*N*) 来衡量出口市场多元化，正向外部需求冲击均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

表1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基于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指数的衡量

变量	(1)	(2)	(3)
	<i>DIV</i> 指标	<i>DIV</i> 指标	<i>N</i> 指标
<i>DemandShock</i>	-0.0318 *** (0.0004)	-0.0010 ** (0.0004)	-0.5257 *** (0.0154)
观测值	497 254	479 628	479 628
调整 R ²	0.03082	0.6847	0.08543

注：** $p < 0.05$ ，*** $p < 0.01$ ；上述回归中均控制其他控制变量，除第 (1) 列外，均控制了企业、行业-年份以及城市-年份的固定效应；括号中的数值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2.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基于出口目的地集中度指数

表2报告了以出口目的地集中度指数衡量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并基于基准计量模型式 (6) 进行回归的结果。第 (1)、(2) 列以欧美国家的出口占比来衡量企业出口目的地集中度，第 (2) 列在第 (1) 列的基础上增加了行业一年份维度以及城市一年份维度的固定效应，第 (3)、(4) 列分别以企业层面前 5 大出口目的地的出口份额指标 (*CR5*) 和企业层面出口核心目的地市场份额指标 (*Core*) 来衡量企业出口目的地集中度。由表2可见，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出口目的地集中度指数来衡量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其回归结果均表明正向外部需求冲击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目的地集中度的提升，即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总结表1和表2的回归结果，本文的理论假说得到了验证。

表2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基于出口目的地集中度指数的衡量

变量	(1)	(2)	(3)	(4)
	CR 指标		CR5 指标	Core 指标
外部需求冲击	0.0724 *** (0.0018)	0.0010 ** (0.0005)	0.0082 *** (0.0008)	0.0254 *** (0.0015)
观测值	426 349	393 045	496 663	496 663
调整 R ²	0.06906	0.7648	0.1206	0.106

注：** $p < 0.05$ ，*** $p < 0.01$ 。

(二)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讨论与工具变量回归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即企业面临的外部需求冲击是以企业层面的出口结构为权重对出口目的地的进口需求进行加权而成的。基准回归中，在计算企业层面外部需求冲击的加权权重时，借鉴 Aghion 等（2022）的做法，本文使用企业在出口初始年份的出口权重作为企业样本期内的权重，该权重不随时间变动，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使所构建的核心解释变量相对外生。但这一做法可能忽略了以下问题，即企业可能在某一目的地或某一种产品上具有很高的出口份额，该企业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其出口额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该出口目的地对此产品的进口额发生改变。此时用出口目的地—产品层面衡量的外部需求冲击就是企业因素引起的，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为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进一步使用企业滞后 1 期即 $t-1$ 期的出口结构和扣除企业自身出口后的城市—行业的出口结构作为计算企业层面外部需求冲击的权重。

为了尽可能保证核心解释变量的外生性，在基准回归中，对于外部需求冲击这一指标的测度，所使用的出口目的地进口需求总额已经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做了剔除，以确保外部需求的变动与中国企业出口不存在相关性。但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将源自中国的进口予以剔除，很可能导致对外部需求冲击这一指标的测度存在偏误。如果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在某一目的地市场中占据了绝对地位，那么，这种做法很可能低估了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外部需求冲击。为此，本文参照钟腾龙和余森杰（2020）的做法，计算了中国每个企业每种产品在目的地市场的出口份额，结果表明，中国只有不到 3% 的企业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市场份额高于 0.01。因此，本文对于外部需求冲击这一指标的测算，将中国的出口从出口目的地的进口中予以剔除，对出口目的地的进口需求总量的影响很小。

为了进一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 Basto 等（2018）^[36]的做法，使用出口目的地的实际汇率与企业初始年份是否出口的交互项来构造工具变量，即 $\ln(RER_{dt}) \times I_{idt_0}$ 。其中， I_{idt_0} 表示企业 i 是否在初始年份 t_0 出口到目的地 d ，出口目的地 d 在 t 年的实际汇率为 $RER_{dt} = \varepsilon_{hdt} / (CPI_{ht} / CPI_{dt})$ 。其中， h 表示母国即中国， ε_{hdt} 为名义汇率（直接标价法），定义为每单位目的地货币兑换母国货币的数量。其中 CPI 和名义汇率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FS 数据库。

本文对于工具变量的构造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各个企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对于已经与出口目的地买家建立关系的中国企业而言，其更容易受到目的地市场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将出口目的地的实际汇率与企业初始年份是否出口交乘作为工具变量。构造的这一工具变量，其相关性在于：实际汇率上升会促进本国出口，即外部需求会增加，将实际汇率进一步与企业初始年份是否出口交乘使这一工具变量不仅变为企业层面的变量，而且增强了与企业个体的相关性，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其外生性在于：一是实际汇率的变动更多地受两国宏观环境和政策的影响，不会受到企业个体层面出口行为的影响，即二者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二是企业初始年份是否出口这一变量，虽与企业个体有关，但时间固定在初始年份，相当于控制了企业在初始年份的基本特征，排除了其对企业除外部需求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三是这一工具变量也只能通过企业外部需求冲击影响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即该工具变量与计量模型式（6）中的扰动项无关。此外，以乘积形式构造的这一工具变量保证了其在时间维度与企业个体维度的变动。

本文选取中国在2000年出口值最大的前50大出口目的地的实际汇率与企业初始年份是否出口交乘项作为企业外部需求冲击的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①。

表3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

变量	(1)	(2)	(3)	(4)
	<i>DVI</i>	<i>N</i>	<i>CR5</i>	<i>Core</i>
外部需求冲击	-0.0633 *** (0.0055)	-1.3526 *** (0.1543)	0.0200 *** (0.0022)	0.0604 *** (0.0036)
观测值	484 774	463 782	463 782	463 782
调整 R ²	0.06073	0.1892	0.1298	0.1216

注：*** $p < 0.01$ ；上述回归中均控制其他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企业、行业—年份以及城市—年份的固定效应；括号中的数值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2. 稳健性检验

(1) 基于企业外部需求冲击指标再测度的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确保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分别使用扣除企业自身出口后的行业出口结构和滞后一期的出口结构作为计算企业层面外部需求冲击的权重，然后基于计量方程式（6）并以 *DIV* 指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再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第（1）、（2）列所示，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①本文在工具变量回归中使用了50个出口目的地的实际汇率与企业初始年份是否出口交乘项，即有50个工具变量，因此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较多，若要详细解释，则需要占据较大的篇幅。为节省篇幅，也考虑到本文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与Basto等（2018）的相近，本文不报告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类似结果可参阅Basto等（2018）的文献。

表4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多元化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以企业滞后一期的出口结构为权重	以城市-行业其他企业平均出口结构为权重	基于出口年数大于3年的企业样本	基于出口年数小于或等于3年的企业样本	基于出口年数大于8年的企业样本
<i>DemandShock</i>	-0.0087*** (0.0022)	-0.0112*** (0.0017)	-0.0010** (0.0004)	-0.0034** (0.0016)	-0.0011* (0.0006)
观测值	378 421	510 741	454 204	55 587	204 850
调整 R ²	0.7302	0.6819	0.6876	0.6072	0.7082

注：* p<0.1, ** p<0.05, *** p<0.01。

(2) 基于企业样本重新筛选的稳健性检验。基于企业出口的连续性对样本重新筛选。在短期，企业会进入不同出口目的地去探寻其市场需求状况，一些企业在进入某个特定出口市场后可能很快就退出该市场（Berman et al., 2015）。由于样本中连续出口企业只占样本总量的3.7%，即使其中有8年出口的样本也不超过30%，因此本文根据企业出口行为的连续性将总样本拆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出口年数大于3年的企业；二是出口年数小于或等于3年的企业；三是出口年数大于8年的企业。然后，分别对重新筛选后的子样本做与前文同样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第(3)、(4)、(5)列所示。可以看出，基于重新筛选后的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负向影响依然保持显著，意味着本文的回归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五、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一) 基于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的机制检验

1. 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

在机制检验之前，需要对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进行测度。本文分别以中国企业出口目的地的制度质量和中国企业出口到某个目的地的出口企业数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企业的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本文借鉴易靖韬等（2021）^[37]的做法，选取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WGI）中的监管质量（RQ）和法律法规（RL）这两个分指标来刻画出口目的地的制度环境，并用以衡量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

以2000年中国出口到各目的地的企业数为标准进行排序，可以获得中国企业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及其相对应的制度环境指标，其中，制度环境指标包括监管质量（RQ）和法律法规（RL），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中国出口企业数较多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RQ和RL的排名相对靠前。如果以制度环境来衡量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那么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较

^①因篇幅所限，具体的指标值及其排名未列出，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刊文补充数据查询”栏目查阅、下载。

低的国家，中国出口到该国的企业数也较多。

图 1 中的左图展示了 2002 年中国出口企业数排名前 100 的以监管质量 (RQ) 来衡量的出口目的地制度环境与其对应中国出口企业数的相关关系，右图展示了中国出口企业数排名前 100 的以法律法规 (RL) 来衡量的出口目的地制度环境与其对应中国出口企业数的相关关系。图 1 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分别以出口目的地的制度环境和中国的出口企业数来衡量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是合适的。作为对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的衡量，二者可以替代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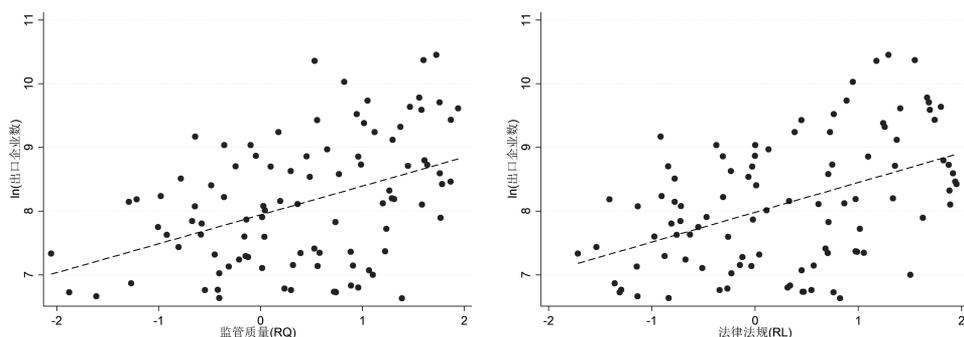


图 1 2002 年出口企业数排名前 100 的出口目的地制度环境与其对应的出口企业数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库 & WGI

2. 基于企业一目的地的出口占比的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假说，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使用企业一目的地的出口占比对企业层面外部需求冲击进行回归，计量方程如下：

$$Y_{idt} = \alpha + \beta_1 DemandShock_{i,t-1} \times M_{dt} + \beta_D DemandShock_{i,t-1} + \beta_M M_{dt} + \gamma_i Z_{it} + \delta_i + \delta_{st} + \delta_{ct} + \varepsilon_{idt} \quad (8)$$

其中， Y_{id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出口到目的地 d 的出口占比。 $DemandShock_{it}$ 为企业 i 受到的外部需求冲击， M_{dt} 表示出口目的地 d 的制度环境水平，分别使用监管质量 (RQ) 和法律法规 (RL) 这两个指标来衡量。 δ_i 表示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δ_{st} 和 δ_{ct} 分别表示企业所在行业一年份和企业所在城市一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s 为 GB2 位码的行业， ε_{idt} 为随机扰动项。

具体而言，按照出口目的地 2000 年的监管质量 (RQ) 和法律法规 (RL) 将主要的出口目的地进行排序^①，使用两个对应指标，分成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低的国家 ($M_{dt} = 1$) 和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高的国家 ($M_{dt} = 0$) 两组。计量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表 5 第 (1)、(2) 列分别检验了以监管质量衡量的出口目的地制度环境水平作用机制和以法律法规衡量的出口目的地制度环境水平作用机制，可以看出，二者的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符合理论预期。该结果表明，在正向外部需求冲击下，企业在制度环境水平越高亦即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

^①这里仅以出口企业数排名在前 100 的出口目的地为样本。

成本越低的国家的出口份额越大。在正向外部需求冲击下，正如本文在理论部分所阐述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增加得更多一些，且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水平相对较高亦即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企业的出口更加集中于发达国家，从而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进一步，本文在企业所在的行业层面检验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的不同在外部需求冲击影响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中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符合预期^①。

表5 外部需求冲击、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与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
基于企业-目的地的出口占比的检验

变量	(1)	(2)
	<i>RQ</i>	<i>RL</i>
<i>DemandShock</i>	-0.0068 *** (0.0003)	-0.0068 *** (0.0003)
<i>DemandShock * M</i>	0.0091 *** (0.0004)	0.0096 *** (0.0004)
<i>M</i>	0.0334 *** (0.0018)	0.0298 *** (0.0014)
观测值	3 631 661	3 889 495
调整 R ²	0.2252	0.2252

注：*** p<0.01。

(二) 基于企业要素密集度和企业出口规模不同的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基于基准计量模型式(6)并以 *DIV* 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从企业要素密集度和企业出口规模两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1. 基于企业所在行业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借鉴黄先海(2006)^[38]、祝树金和张鹏辉(2013)^[39]的研究，基于企业要素密集度的不同进行分样本回归，同时考虑到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出口竞争力的变化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本文选择以2007年为临界点进行分时段回归，回归结果表明^②，在2000—2006年期间，正向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但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没能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在2007—2013年期间，正向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但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没能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其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较早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加入WTO的早期阶段，大量颇具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涌向了国际市场特别是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在2000—2006年期间外部需求冲击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①因篇幅所限，此处略去详细回归结果，查阅同前。

②因篇幅所限，此处略去具体的回归结果，查阅同前。

2. 基于企业出口规模不同的异质性分析

企业出口规模的不同可能会影响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因此,本文按企业出口规模将企业样本分成出口规模较大企业和出口规模较小企业,回归结果表明^①,正向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出口规模较大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但对出口规模较小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遇到外部需求冲击时,相对于出口规模小的企业而言,出口规模大的企业有更大的调整空间,也有更强的应对和调整能力。特别是在面对负向外部需求冲击时,出口规模小的企业很可能就直接退出了出口市场。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库企业数据库,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促使企业更多地选择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较低的市场,从而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且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出口规模较大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当前,中国总体上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负向外部需求冲击,因此倡导并助力企业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多元化正当其时。推动中国企业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其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助力企业摆脱对传统发达国家市场的过度依赖,加大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力度。第二,在当前的外部需求冲击以负向外部需求冲击为主导的背景下,企业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并选择进入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相对高的市场,或是提升其出口份额。政府可通过调整贸易政策、提供更多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签订更多的自贸区协定等手段降低企业总体上的出口贸易成本,特别是努力减轻企业因为选择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较高的市场所带来的额外负担。第三,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也需要考虑到如何让不同要素密集度和不同出口规模的企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助力出口企业在负向外部需求的冲击下实施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参考文献]

- [1] EGGER H, EGGER P, KREICKEMEIER U. Trade, Wages and Profit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3 (64): 332-350.
- [2] AGHION P, BERGEAUD A, LEQUIEN M, et al.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Market Size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level Export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2: 1-56.
- [3] ALESSANDRIA G, KABOSKI J, MIDRIGAN V. Trade Wedges, Inventorie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3, 60 (1): 1-20.
- [4] ENGEL C, WANG J.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urable Goods: Understanding Volatility, Cyclicalities and Elasticit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3 (1): 37-52.

^①因篇幅所限,此处略去具体的回归结果,查阅同前。

- [5] 戴翔. 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之谜研究综述 [J]. 经济学动态, 2016 (9): 134-142.
- [6] EATON J, KORTUM S, NEIMAN B, et al. Trade and the Global Recess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 (11): 3401-3438.
- [7] BEMS R, DI GIOVANNI J. Income-induced Expenditure Switching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 (12): 3898-3931.
- [8] 陈晓华, 金泽成, 余林徽. 外需疲软会降低中国出口型企业的价格加成吗——来自 2000-2007 年持续出口企业的经验证据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 (4): 14-26.
- [9] 谢杰, 金钊, 项后军, 等. 外部收入冲击、产品质量与出口贸易——来自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 [J]. 财贸经济, 2018, 39 (5): 113-129.
- [10] IMBS J, WACZIARG R.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 (1): 63-86.
- [11] CADOT O, CARRÈRE C, STRAUSS-KAHN V. Export Diversification: What's Behind the Hump?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 (2): 590-605.
- [12] AGOSIN M R, ALVAREZ R, BRAVO - ORTEGA C. Determinant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round the World: 1962-2000 [J]. The World Economy, 2012, 35 (3): 295-315.
- [13] 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 (1): 1-25.
- [14] VANNOORENBERGHE G. Firm-level Volatility and Expor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 (1): 57-67.
- [15] VANNOORENBERGHE G, JANEBA E. Trad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distribu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98): 233-244.
- [16] VANNOORENBERGHE G, WANG Z, YU Z. Volatil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Exports: Firm-level Theory and Evidenc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6 (89): 216-247.
- [17]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 (6): 1695-1725.
- [18] 钱学锋, 熊平. 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 [J]. 经济研究, 2010, 45 (1): 65-79.
- [19] 易靖韬, 乌云其其克. 中国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10): 53-64.
- [20] MAYER T, MELITZ M, OTTAVIANO G. Product Mix and Firm Productivity Responses to Trade Competition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
- [21] 钟腾龙, 余森杰. 外部需求、竞争策略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0): 119-137.
- [22] 袁莉琳, 李荣林, 季鹏. 出口需求冲击、产品组合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J]. 经济学 (季刊), 2020, 19 (4): 1167-1190.
- [23] 鲁晓东, 李林峰. 多元化水平与中国企业出口波动: 基于产品和市场组合的研究 [J]. 统计研究, 2018, 35 (12): 56-67.
- [24] 吴嵩博, 崔凡.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偏好——基于开发区准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0 (2): 157-174.
- [25] 黄先海, 周俊子. 中国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产品广化及其结构优化 [J]. 管理世界, 2011 (10): 20-31.
- [26] CASELLI F, KOREN M, LISICKY M, et al. Diversification through Trade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 (1): 449-502.
- [27] ROBERTS M, TYBOUT J. The Decision to Export in Colombia: An Empirical Model of Entry with Sunk Cos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545-564.
- [28] BERNARD A, JENSEN J. Why Some Firms Export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4, 86 (2): 561-569.
- [29] LAWLESS M. Firm Export Dynamics and the Geography of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77 (2): 245-254.

- [30] BALDWIN R, OKUBO T.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 (3): 323-346.
- [31] MAYER T, MELITZ M J, OTTAVIANO G. Market Size, Competition and the Product Mix of Exporte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 (2): 495-536.
- [32] HELPMAN E, MELITZ M, RUBINSTEIN Y. Estimating Trade Flows: 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 (2): 441-487.
- [33] BRODA C, WEINSTEIN D. 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21 (2): 541-585.
- [34] 樊海潮, 郭光远. 出口价格、出口质量与生产率间的关系: 中国的证据 [J]. *世界经济*, 2015 (2): 58-85.
- [35] BERMAN N, BERTHOUS A, HÉRICOULT J. Export Dynamics and Sales at Hom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6 (2): 298-310.
- [36] BASTO P, SILVA J, VERHOOGEN E. Export Destinations and Input Pric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 (2): 353-392.
- [37] 易靖韬, 蔡菲莹, 蒙双, 等. 制度质量、市场需求与企业出口动态决策 [J]. *财贸经济*, 2021, 42 (9): 145-160.
- [38] 黄先海. 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测度与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6 (5): 12-16.
- [39] 祝树金, 张鹏辉.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及其影响因素 [J]. *统计研究*, 2013, 30 (6): 58-66.

The Effect of External Demand Shocks on the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of Firms

ZHANG Mingzhi HE Hongl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demand shocks on the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firms. Utilizing panel data from the China Customs Database and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3, we elucidate the effect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external demand shock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straining firms'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Notably, external demand shocks prompt Chinese firms to choose export markets characterized by lower fixed costs for entering the destinations, thus significantly inhibiting their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Moreover, this study observes a dynamic evolution in the impact of external demand shocks on the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of firms with different factor intensities. This impact transforms from significantly restrain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abor-intensive firms from 2000 to 2006, to significantly constrain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apital-intensive firms from 2007 to 2013. The external demand shocks significantly hinder the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of firms with a large export scale, while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irms with a smaller export scale. This paper has certain policy implication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the enhancement of Chinese firms'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through active responses to external demand shocks.

Keywords: External Demand Shocks;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Fixed Costs of Export Destination Entry

(责任编辑 王 瀛)